

曾荫权： 香港和内地共同发展

10

年前的一个春日,再过3个半月香港就要回到祖国的怀抱,时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在香港西贡的焦坑挥铲种下了一棵小树苗,港人称之为“回归树”。10年栉风沐雨,回归树如今已枝干挺拔,“一国两制”条件下的香港特区也变得成熟和练达。

在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全球经济不景气和非典疫情等一连串考验后,2006年香港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创纪录的27466美元,今年6月,香港恒生指数再创历史新高,股市市值达到16万亿港元。3年来,香港经济平均增长7%以上,通货膨胀维持2%以下的低水平,目前香港的失业率已降至4.3%,为5年多来最低。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不无自豪地说:“香港经济已经达到20年来的最佳状态。”

香港走过了10年,留下一连串闪光的足迹,无论是前无古人的“一国两制”伟大实践,还是令人瞩目的经济成长,乃至正在构建中的和谐社会……所有这些都足以让人称羨,但惯于居安思危的港人却并未因此而沾沾自喜,他们正从10年来的经历中思考着下一个10年,以至更长的发展路向。数码港建成运作,创意产业委员会随之成立,《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署实施……香港开始在新的历史坐标中寻求新的定位。伴随着一系列转型与升级的探索,经历了若干失败与成功的尝试,一个思路逐渐明晰,一种共识慢慢形成,未来的轮廓开始显现。

“明艳紫荆风中争胜,找对了路径,花瓣开得繁盛。”这是被确定为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主题曲中的一段歌词。古语云,歌由心生,歌词道出了众多港人的心声。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的话说,回归10年,是“一国两制”成功落实的10年,是香港成功的10年。现在“找对了路径”的香港又站上了历史的新起点,新的辉煌正在前方不远处召唤。

成功十年

◎本报特约记者 白冰/文 宫磊/摄

1997年到2007年,是香港不平凡的10年。在香港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依然带着其标志性的领结,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回顾这10年,曾荫权对记者说,“这10年的经历,有起伏,总的说是一个成功阶段……”这10年时间里,香港逐步摆脱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经济成功转型。随着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自由行政政策的出台,内地与香港之间经济进一步融合,强有力地刺激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一国两制”空前成功

记者:回归十年,您如何评价“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落实情况?

曾荫权:我到北京接受任命的时候,温总理对我说香港这10年,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的确,一国两制是一个不平凡的概念,是从来没有的。和“一国两制”一样,香港这10年的经历,所发生的事,都是一个不平凡的过程。我总体感觉,香港比1997年前,更坚固,更成熟,更了解自己将来的道路。

毫无疑问,“一国两制”是空前的成功。对香港人而言,“一国”认知感是一天比一天强。对于两制,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自由,香港人重视的法治、公平的社会、流通的货币,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有增强。可以说,香港不单维持原貌,保持原有的价值观,而且还获得了持续增长,为国家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贡献。

所以说,这10年,是“一国两制”成功落实的10年,是香港成功的10年。

与内地互补多于竞争

记者:目前,内地经济发展很快,您是否担心香港金融、航运、物流国际中心地位不保?

曾荫权:分析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看香港跟内地城市不同的地方。香港是个国际金融中心,90%是服务业。香港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有着独特的优势,比如香港的法律制度、城市的国际性,比较廉洁的公务员制度、自由港、完全流通的货币制度等。

但无论广州或者上海,都是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也是最重要的制造业城市。我看不到香港与其他内地城市有任何恶性的竞争。相反,香港和很多内地城市之间有着良性的配合。可以说,香港和内地城市,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而是互补性很强的关系。比如,香港发展金融业,对于广州、上海、北京等内地城市的发展,一定有正面作用,而不是负面作用。

当然,在有些方面,香港和内地城市也可以开展竞争,比方说集装箱码头。香港的物流已不单是海上物流,也包括高附加值的空运方物流。从这方面说,香港也会随着市场要求,特别是内地的发展情况,而作出调整。

香港在不停地变动,不停地蜕变,这个过程是不会停下来的。

双赢是工作的出发点

记者:您如何看待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这份工作?



曾荫权:基本法已经把特首的工作写得很清楚。我要向国家和中央负责,也要对香港市民负责。

对香港市民负责,重要的不是制定怎样的政策,最重要的是要走出礼宾府,跑进人群,跟香港市民面对面的谈,了解他们的情况。我在选举的时候对这一点感受深刻。面对面地去了解各个阶层的想法,远远比从报告中去了解来得深刻和充分。所以,我希望每个星期,有一两次机会跑入人群,和香港人面对面。

国家目前的发展,给予香港很大的机会,特别是国家的“十一五规划”给香港的定位: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国家支持香港航运业、物流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

我同香港的学者,各行各业人士举行经济高峰论坛,研究全面的、相应的工作,为未来五年的工作制定行动纲领。在去年的高峰论坛上,与会者提出了200多条策略,这些我们会一一落实。

这些策略,还有我的政纲,都基于一个双赢的出发点,也就是有利于香港和内地的共同发展,这也是我未来五年工作的出发点。

五策略打造和谐社会

记者:您曾经谈到香港未来的挑战是经济政治构建和谐社会,那么您在第三届任期如何开展工作?

曾荫权:我在施政报告提到香港面对的挑战提出了五个应对的策略:

第一,为巩固香港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经济基建和配套也要迈向自主创新与高增值,特区政府有责任为此创造有利条件,包括资讯、科技、文化和创意产业。

第二,重视家庭是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念,和睦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基石,特区政府的社会政策,会继续以支持家庭、巩固家庭和促进家庭的福祉为核心。

第三,香港有能力缔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也理应拥有更美好的环境。从速采取果断措施,改善空气质量以至整体环境质量。

第四,民主制政方面,今年夏天会发表政制发展绿皮书,谈论普选怎么落实的问题,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第五,关于和谐社会,要提升香港的生活素质,不单是工资、环保,还有医疗服务、食物安全。我很相信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工作的重心,就是环绕着我去年施政报告所提出的挑战办事,一定应该有一个良好结果的。



藏富于民

唐英年： 过去3年 经济均长7.6%

◎本报特约记者 白冰/文 宫磊/摄

过去10年,香港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4%。过去3年,香港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7.6%。

回顾10年来香港经济经历的挑战,香港财政司司长、即将在第三届特区政府担任政务司司长的唐英年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香港经济之所以能够从亚洲金融危机,从SARS疫情中“走出来”,经济全面复苏,得益于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香港居民的共同努力,和13亿内地同胞的支持。

香港经济仍在高增长

记者:2004年-2006年,香港经济增长率从同比数字看,却呈逐年下降的态势。这是否说明香港长期的增长后劲不足?

唐英年:香港是一个相对已经成熟的经济体,而内地则属于快速发展型,两者有很大的不同。

过去10年,香港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是4%,相对于西方成熟市场1%-2%的年增长率,已经属于较快的增长速度。过去三年的平均增长率是7.6%,比4%高出近一倍。这说明从长期而言,香港经济仍在一个高增长的轨道中。

但是高增长,也给我们带来了压力,比如通胀。每年增长率达到7%-8%,就会有较大的通胀压力。我认为4%-5%的经济增长率,2%左右的通胀率,是一个成熟经济体比较健康的表现。

香港和内地不同,香港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体系,如果高通胀伴随高速增长而来,对基层市民的生活会造成很大压力,我们不想看到这种情况。

发挥好“桥梁”作用

记者:您认为香港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

唐英年:过去,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引进来”的平台,做得很成功。到目前为止,内地引进的外资约有40%左右通过香港这个平台。香港还协助内地企业筹集资金及走向国际市场,同时为内地资金“走出去”提供环球投资平台。同时香港是个开放平台,有西方投资者所了解的法律制度。所以我相信,今后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引进来,走出去”的平台将继续而且更加成功。

此外,香港金融机构和专业人才可以“走进”内地市场,以提升内地企业管治水平和引进创新的金融产品,并提高内地的资金流通效率。同时,通过扩大人民币业务,香港可以成为人民币走向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使用的试验场。

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最重要的一点,就看这样做是否对国家、对改革开放有贡献。我认为,内地和香港的资本市场未来可以建立一种“三互”的关系:互动、互助、互补。简单地说,两地市场在不同发展阶段,可以扬长补短,发挥互惠共赢的局面。内地对香港高水平的金融服务业的需求将长期存在。

资产价格下调是考验

记者:您认为回归10年来,香港经济遇到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唐英年:回归10年,香港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资产价格下调。不过,香港的联系汇率与美元挂钩,对货币有稳定作用。当时,香港的房地产住宅价格在一年下调接近60%,这在其他市场很少见。虽然香港按揭很普遍,按揭幅度通常为70%。资产价格下调60%,就出现了负资产,对银行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过这个过程中没有银行倒闭,这说明香港银行的自身管理和政府对银行的监管是比较完善的。

除此之外,通缩也曾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考验。从2000年-2004年,香港经历了长达5年的通缩,累计通缩幅度达到14%左右,GDP平减指数下降24%左右。从数字说,一个经济体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没有崩溃,这是很大的挑战。

我们怎么走出来的呢?2003年8月我出任财政司司长的时候,那时通缩到了最低点,失业率也到最高点8.6%,经济负增长,还碰到SARS疫情。但是我对香港人的应对能力是很有信心的。

上任时我做了很多咨询,走访了不同的团体,在征求多方意见后,我们决定首先依照基本法,做到财政预算量入为出,力求收支平衡。其次,在做好公共财政管理的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刺激经济增长。2003年6月,内地和香港签订了“关于更紧密加强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居民以个人身份赴港旅游的政策也开始实施,这些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香港经济复苏。

两年时间,我们就恢复了公共财政的收支平衡,去年还有了财政盈余。于是政府推出了价值200亿港元的减税计划,藏富于民。我们相信,一块钱放在市民口袋里,用起来要比放在政府口袋里更灵活,更能发挥作用。

税低易扩大贫富差距

记者:温总理之前表示,香港经济还存在深层次问题,您认为是什么?

唐英年:深层次问题是有的,和边缘化有连带关系。

每个社会都有一些深层次矛盾。香港这个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鼓励创新、鼓励创业。但我们的税收很低,只有17.5%的利得税,其他的税几乎没有。最近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世界经济体税制痛苦指数,香港排名倒数第二。但是,税收过低也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小经济体要应对挑战,一定要有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因为你的竞争对手不仅是内地、亚洲,是全球性的。

不过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对居民提供住房,保证其基本生活质量。比如说,一家四口,父母没有工作,我们每月提供的是9000多港元保障,同时可以租政府的房子,子女免费入学,大学也可提供资助,不会因为没钱而上了不了大学。医疗基本上也很便宜。有交通意外,每天68元,还提供医疗费、药费、住院费以及一天四餐。香港要在继续创业和创新的前提下,从和谐社会角度出发,考虑进一步完善保障。

此外,由于香港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上马很慢,从前期咨询到真正实施过程比较长,这与内地有很大不同。在内地一个五年计划香港通过两个五年能做到已经算不错了。